

新松集

姚文元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 松 集

她 女 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乐秀鎬 装帧

新 松 集

著 者 姚 文 元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毫米1/32 印张：11 1/4 字数：228,000

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200册

统一书号：10078·1975

定价：(九)1.20元

前 記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所写的关于我国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些評論。这些优秀作品，大都是在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現的。有意把評論好作品的一部分文章汇集在一起，是想借此可以略为看出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学多方面的成就。自然，这里所涉及的只是大花园中群花的一角，但仅从这一角看，已經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是如何丰富多采，如何朝气蓬勃地在向前发展着了。

今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本集子里評論的作品，就是在毛澤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光輝成就的一部分。这些作品，雄辯地証明着毛澤东文艺思想的正确性，証明着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和推陈出新的方針，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最正确最廣闊的道路。这些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巨大的，經驗是丰富的。当然，他还要成长，他还要前进，他还要学习，他还要斗争，还要跟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一同发展，不会停步，也不会自滿。但将来更大的成就，并不意味着目前这些好作品是不足道的。那些有着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深刻的思想內容、相当高度艺术成

就的作品，那些經過群众考驗，在政治、思想、道德的教育作用、認識作用、美化人民心灵和生活的作用上达到相当程度的作品，是会作为这一阶段文学发展的里程碑而列入社会主义文学史的。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部分是单篇、单本的評論，只有少数是作綜合分析的。曾經有过这样的想法：把本书論及的和未曾論及的艺术形象，在序言中作一个綜合的分析与比較，作为一种补充。但一当想着手，就觉得这不是短時間能作得了的，只好作罢，易以前記。一般說，对每一部作品作具体分析，是首要的，是綜合分析的基础。它的好处，是能及时对新的作品有反映，并可能較深，但在揭示艺术現象的历史发展及相互联系上，是有一定限制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及艺术风格，只有在发展中、联系中去看，才能看得較为确切与深刻，一个作品的分析，往往不能顾及这一点。艺术作品、艺术形象的綜合分析的长处，是能揭示許多艺术現象的源流与本质，并且从比較中能够分出各种作品的特色，及許多值得肯定的作品中那些更好，是“上品”，那些較次，或彼此各有何相互区别的长处；不同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它們之間内部联系如何。但綜合分析若不以具体分析为基础，常要用大部分篇幅用于叙述与分类，易于琐碎抽象，評論的深度受到限制。理想的，是把对一部作品的具体分析同綜合分析結合起来。这种綜合分析，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去进行。或以现状为主，或以历史分析为主，或两者并举。我們首先需要的当然是有更多更好的对个别作品的深入分析，同时也迫切需要加强綜合分析，現在的情况是后一方面工作比前一方面薄弱，自己做不到，是极希望

經常有一部分同志肯花時間來做這個工作的。

我深感如何正確運用藝術批評的兩個標準用於分析具體作品，做到準確、全面、生動、具體、深入，是很不容易的。這本集子裡的評論文章雖作了一些努力，但限於水平，在掌握標準的分寸上，一定會有不準確的地方，這就請讀者們來批評指正了。——我有意寫上“批評”這個詞，因為現在“批評的批評”同批評本身一樣，都是需要發展的。

杜甫有兩句有名的詩：“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這本書名是取自前面一句詩。

1962年1月25日

目 次

前 記	III
从阿 Q 到梁生宝	1
——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史	17
——讀《创业史》	
論《林海雪原》	44
一部閃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輝的小說	58
——評《青春之歌》	
評《草原烽火》	78
战斗生活的頌歌	96
——讀《在和平的日子里》	
童話中的真理	127
——讀《宝葫芦的秘密》	
鮮明夺目的紅旗	138
——介紹刘白羽的《政治委員》	
論《風雪之夜》	150
充滿朝气的作品	172
——介紹《爱情的开始》	

讀《誰是奇迹的創造者》	176
——給胡万春同志的一封信	
《特殊性格的人》序言	183
新的起点	198
——讀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	
努力反映农村生活中的新事物	204
——談李准短篇小說的几个特点	
水兵的心,水兵的歌	217
——讀《水兵生活速写》	
响彻云霄的贊歌	227
——讀《紅旗歌謠》	
論新民歌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	238
論《白兰花》和《丁佑君》	258
——一个艺术上的对比	
无产阶级的英雄花	304
一个深刻的悲劇	325
——論魯迅的《伤逝》	
用阶级斗争的历史經驗教育人民	339

从阿Q到梁生宝

——从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

最近在文学批评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对于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人物形象，感到越来越大的兴趣。《文艺报》和其他的一些报刊，都登载了关于《创业史》中梁生宝这个人物的分析文章；《文学评论》和《剧本》上发表了好几篇探讨光辉的农民歌手刘三姐形象的评论；《光明日报》上展开了对《三家巷》中周炳这个人物不同意见的争论；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中所塑造的性格鲜明的新人物，也都受到了普遍的关注。这个情况，是同第三次文代会指出的下述的趋势相适应的：“从近年来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作家对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和宏伟气魄，描写得越来越鲜明和深刻，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更加细致和丰满了。”（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分析人物，就要指出这个人物的社会意义，以及它对人民所起的实际的认知作用和美感作用；同时，还要探讨、研究作品在艺术典型化上的成就、经验、特色或不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如果不从历史分析出

发，孤立地談人物，那就可能会钻进牛角尖。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人，总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
联系的，不从分析历史条件出发，不但不能判断人物的典型
意义，也不能够判断究竟这个人物塑造得是否正确和是否符
合历史真实。用形象反映现实是一切艺术共同的特点，但各
个艺术領域在表现手段上又各有不同。文学区别于音乐、美
术的艺术特点之一，就是文学作品能够用文字具体地描写变
化着、发展着的历史过程，从历史过程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这里指的历史过程不仅是指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包括了每个
时代各个階級生活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文学形式中，詩比較
接近音乐，詩是联系音乐和文学的一座桥梁。有一部分抒情
短詩就其只是集中、凝练地描繪一个片段的情与景而言，又
比較接近于繪画，所以过去有“詩中有画，画中有詩”之說。
把具体地、形象地描写历史过程这个特点發揮得最充分的是
小說。我們可以作一个簡單的比較：在美术作品中，人物的
性格是强烈地从特定的一瞬間表現出来，人物的典型意义，表
現在根据主题思想用艺术构思組織起来的一个形象或一群形
象的某一个特定的姿态上。一幅美术作品中，人物形象只能
是已經創造完成的形象，观众欣賞一幅画或一座塑象，从初
看到最后获得深刻的印象，主观印象有深淺之別，人物形象
本身則是不变的。但文学作品就不同，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
的性格不是濃縮在特定的一瞬間，而是展开为一个連續的过
程，人物不是靜止不变，而是从一出場就在行动着，只有在生
活的发展中，才能够写出人物的性格。讀者只有經過一定的
过程，才能对人物性格有一个明确的印象。作品第一頁的人

物形象和最后一頁的人物形象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要行动，就一定是在社会上行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行动，不是在真空中脱离社会生活而行动。一座优秀的鲁迅的胸象或一幅鲁迅的肖像画，可以除了鲁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而有力地表现出他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的精神面貌。但要用文字描绘鲁迅在生活中的形象，却非要写到鲁迅的某一段生活过程，他和别人的关系、他处的环境、他的工作、他的斗争、他的行动，不然根本无法刻画鲁迅的精神面貌。优秀的小說中所塑造的典型人物，不管是表现他的生活的全部历史或某一个片断，都是通过生动的富有特色的性格，概括了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阶级、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特点的。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分析人物性格的历史中，分析时代，分析环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作品的教育意义或者有何局限性。我们不但可以对一本小說、一篇小說中的人物作分析，还可以把不同的作品中的人物从他们相互关系上进行分析，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可以把许多反映农民生活的优秀作品中的物形象联系起来，从历史发展上加以比较。我们可以从鲁迅的《阿Q正传》、梁斌的《红旗谱》和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这三部小說中，深刻地看到三个不同时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历史道路。

从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不准革命”的悲惨命运。阿Q

不是什么表现“民族共同心理即民族精神”的典型，不是抽象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也不是从一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人们中的一种共同的精神特点”或什么“人类共同的弱点”。我们不能因为分析阿Q形象的困难，就用某种超阶级的人性来代替对人物形象的阶级分析，否定阿Q作为一个农民的现实基础。当然，阿Q也不是离开了鲁迅的思想，“不加任何涂饰地真实地再现生活”的结果，在阿Q形象塑造上，鲜明地表现着鲁迅的革命观点和他热烈的爱憎；也表现着鲁迅当时对农民革命力量认识、估计所达到的程度。阿Q的形象没有概括农民中英勇斗争的性格。但阿Q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自己独特个性的贫苦的乡村劳动农民，是一个“质朴，愚蠢，但也染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的农民，并且是生活在辛亥革命时代的贫苦的乡村劳动农民（按其社会地位来说是雇农），他属于农民中的落后部分，是贫苦农民中还没有觉悟的那一部分的一种典型。由于鲁迅当时痛感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深切地感到斗争的重要，特别是农民起来斗争的重要，他十分强调地突出了阿Q身上的缺点（所谓“精神胜利法”），愤怒地写出了阿Q悲惨的结局，满腔热情地希望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真正地觉悟起来，彻底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阿Q是一个贫苦的、但思想落后的农民，这就产生了他性格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阿Q身上有着严重的落后意识，甚至是某些受了封建思想影响的落后意识，这不能够代表被压迫农民的斗争性；二方面，阿Q终究是一个贫苦农民，因此，阿Q的生活必然同样表现着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阿Q即使落后也仍然会要求革命的。阿Q朦胧的革命要求，曲折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解放要求，这种要求不是

只在一个阶层、而是所有被压迫的农民所共有的，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但在阿Q身上表现为特殊的、异常曲折的形式。在阿Q这个形象中，我們看到了十分独特的个性和广泛的典型性內在的結合，这种个性特征的主要方面又凝結着深刻的历史內容。在文学現象中，大量存在的是集中地表现了某一个階級与阶层精神特征的典型人物。但象阿Q这样，在一个典型人物身上，既深刻地表现了某一个階級与阶层的精神特征，又反映着別階級的思想影响，在文学史上也并非仅見的。处理这种复杂的典型人物，要求作家能够用历史观点去塑造人物，采取有分析有批判的态度，区别主次，区别人物性格中矛盾方面各自的社会根源，不是把它們混为一談，或归之于抽象的人性。有人只看到阿Q身上区别于中国广大要求革命的农民的那种軟弱、自欺欺人的性格，而看不到根本上阿Q还是一个被压迫、被剝削的乡村雇农，因此认为阿Q后来要做革命党，“人格上是两个人”。鲁迅曾坚决反駁了这种說法：“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恐怕也并不是两个。”^①鲁迅坚决地肯定了阿Q会做革命党，这指出了阿Q性格的基本方面，因为阿Q和所有农民一样，对赵太爷之流的深刻仇恨是始終存在的。当然，这种仇恨是通过一个落后农民的个性表现出来的，看不到鲁迅把他的落后意識加以突出批判，而把阿Q夸大地看作能代表广大被压迫农民的斗争性格的典型人物，那同样不符合这个人物的实际。事实上，《阿Q正傳》杰出的

① 《鲁迅全集》第3卷，第282頁。

思想意义，正在于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阿Q这个落后农民身上的缺点以至某些封建意识影响的批判，满腔热情地期望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能够走上发愤图强、革命斗争的道路；另一方面，通过阿Q作为一个有朦胧的但迫切的革命要求的农民所经历的道路和“大团圆”的下场，深刻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农民革命要求的扼杀，尖锐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提出了准不准农民参加革命这样一个民主革命中的根本问题。

在《阿Q正传》里，阿Q朦胧的革命要求所得到的回答，是“不准革命”。赵秀才成了“革命党”，阿Q当然只好上杀场。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但没有损伤赵太爷之流的利益，反而把他们变成了“革命”的“自由党”；那么，希望“造反”的阿Q的一切美丽的梦想，当然都彻底落了空。阿Q在听到革命的风声时，也曾经扬眉吐气一时，他曾经高声大喊：“造反了！造反了！”他热烈地想着：“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他希望“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来招唤他道：“阿Q，同去革命！”他的头脑里甚至已经浮现出赵太爷、假洋鬼子向他跪下讨饶的图画……但是当他真心诚意地要去“结识”革命党，向“假洋鬼子”要求革命时，口说洋文的“洋先生”却用“哭丧棒”把他赶出去，不准他投向革命。在阿Q被假洋鬼子赶出来后，他心里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从此决不能指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农民的萌芽的革命要求，就这样被穿上“维新”外衣的地主阶级镇压下去了。把阿Q送上杀场的，不是别人，正是挂着“革命

党”牌子的“长衫人物”，也就是阿Q要想去投靠的人物。通过阿Q要想革命，“不准革命”，而终于变成“革命”的牺牲者，鲁迅强烈地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指出了它没有触动地主阶级一根毫毛，农民同地主的矛盾丝毫没有解决，反而使一批吸血鬼变成了“咸与维新”的人物，他们在“革命”的幌子下，把想革地主阶级的命的阿Q当作共同的敌人，残酷地杀掉了。鲁迅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指出了不能够指望由资产阶级或披上“维新”外衣的地主向被压迫的农民恩赐革命，他们是不会给被压迫的贫苦农民以“造反”的权利的；要“造反”，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别无出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精神贯穿在阿Q这个形象的塑造上。阿Q和他的伙伴们，当时还不知道，除了“假洋鬼子”一流的革命党外，还有什么人可以“投”，还有什么人能够真正领导他“造反”，把赵太爷们打倒，因为那时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阿Q正传》中没有能够表现出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前途，但《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尖锐的批判和阿Q希望资产阶级领导他“革命”的幻想的破产，实际上是显示了中国农民必须走另外一条完全不同的彻底革命的道路，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从朱老忠（《红旗谱》的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斗争道路。朱老忠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千千万万觉悟了的革命农民的典型形象。阿Q所没有找到的真正的革命党，朱老忠找到了；朱老忠所走的道路，是同阿Q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朱老忠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再也不怕“假洋鬼子”不准革命，而是在共

产党的领导下天不怕、地不怕地打起紅旗鬧革命了。比阿Q后一代的中国貧苦农民，就是同朱老忠一样地在工人階級领导下自己起来打倒赵太爷、馮兰池，取得了真正的解放。乍看起来，朱老忠同阿Q这两个形象是无论如何联系不起来的，怎样能把朱老忠当作和阿Q有联系的典型人物呢？是的，这两个形象存在着千差万别，朱老忠身上根本没有阿Q的那些落后的、封建的意識，沒有絲毫“精神胜利法”的影子；恰恰相反，朱老忠全身都充滿了阿Q所沒有的强烈的斗争精神。朱老忠父亲朱老巩，就曾經要参加义和团去打洋鬼子，这件事給朱老忠印象极深，他就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中國农民一八四〇年以来反帝斗争的英勇傳統。这正是在阿Q这个形象中所沒有的。朱老忠身上，集中地表现了中國农民对地主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也集中地表现了中國农民从长期階級斗争中鍛炼出来的优秀品质。朱老忠对馮兰池的仇，是一个階級对另一个階級的仇，这是你死我活的“血仇”。朱老忠說：“他拿銅錮錮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份血仇！”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他的态度是：“对这些老封建疙瘩，‘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种嫉恶如仇、除恶务尽、对敌人沒有絲毫幻想的斗争性，这种斬釘截铁的打倒封建地主的坚决性，正是前期朱老忠性格中的核心，是世代被殘酷压迫的农民从切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最基本的階級斗争的经验。我們从历代农民起义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階級仇恨是多么深刻。朱老忠身上凝聚着中国劳动人民从苦难生活中鍛炼出来的頑强精神：耐得住艰苦，受得住打击，勤劳朴实，是铁打的硬汉子。为朋友、为階級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挺身而出，赴湯蹈火。活要站着活，死要站

着死，穷一辈子也要“志气一辈子”；为报仇、为雪恨，可以坚韧地忍受和等待：“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朱老忠就是这样一个人物。那么，既然朱老忠同阿Q是这样的不同，为什么还要把这两个形象联系起来谈呢？是的，从上面这些方面看，这两个人物确是找不到什么共同点，一个是先进的、坚决斗争的农民，一个是只有自发、朦胧革命要求的农民，毫不相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说了上面这些，还只是说明了朱老忠性格的一半，仅仅说了这些，朱老忠就可能成为旧时代的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朱老忠同李逵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但朱老忠不是李逵，决定朱老忠的道路的、使他同历史上一切农民革命英雄具有本质区别的，是新的历史条件，是他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启发和提高了的革命觉悟，党的领导把朱老忠的个人复仇提高到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使朱老忠在农民的革命性格中灌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这才使朱老忠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革命的骨干，而不是旧时代的英雄侠客（《红旗谱》第二部中朱老忠的性格，如果按照人物性格本身发展的逻辑，也是不会朝“绿林豪杰”一类人物的方向发展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朱老忠同阿Q有过类似的、然而结局完全相反的经历：他们都寻找帮助农民“造反”的领导人，阿Q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找到了“假洋鬼子”，得到的是被杀头的结局；朱老忠在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找到了共产党，走上了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的翻身的道路。这非常深刻地说明了在不同阶级的领导下，中国两代农民的不同命运、不同道路。阿Q即使是一个同早期朱老忠一样的富有“闯”劲的革命农民，但只